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CSSCI 来源期刊
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经济评论

简 报

2013 年第 4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3 年 7 月 28 日

编者按

1. 劳动禀赋结构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基于技术前沿国家的分析..... 杨飞
2. 知识积累视角下的劳动力资本化研究..... 任洲鸿
3. 各国创业差异典型性事实：基于创业机会来源的解释..... 毕先萍 张琴 胡珊珊
4. 延迟退休一定有损城镇职工养老金利益吗？..... 刘万
5. 中国养老保障的路径选择：政府养老与家庭养老相得益彰..... 江克忠 裴育 夏策敏
6.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户收入？——基于中国家计调查的分析..... 周晔馨
7. 大学毕业生地区间流动预期对失业、收入及人力资本的影响..... 王云多
8. “污染避难所”在中国是否存在？..... 候伟丽 方浪 刘硕
9. 关于我国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随机收敛检验..... 杨骞 刘华军
10. 对外反倾销措施能否改善中国企业绩效？..... 苏振东 邵莹
11. 国际边界效应比国内边界效应大吗？..... 洪勇
12. 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波动平稳化..... 詹新宇 甘凌
13. 消除税收背离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李建军
14. 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功能..... 谢军 黄志忠 何翠茹
15. 新股发行周期影响上市公司质量吗？..... 胡志强 陈钰君 王一竹
16. 引入杠杆率限制能遏制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吗？..... 沈庆劼
17. 个体投资者风格偏好转换与股票收益..... 胡昌生 王永锋 池阳春
18. 经济增长与企业规模动态变化研究新进展..... 肖欢 庄子银

《经济评论》简介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向《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报刊以及网站经济频道等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 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 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 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把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體，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经济理论探索

1. 劳动禀赋结构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基于技术前沿国家的分析

杨飞（南开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

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指技术进步对于提升生产要素如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的边际产出存在差异。如果高技能边际产出相对于低技能劳动边际产出提高得更多，则称这种技术进步为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相反，如果低技能劳动边际产出提高得更多，则称该技术进步为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19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开始扩大，不少学者认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主要原因。

阿西莫格鲁（Acemoglu）和凯莱（Kiley）较早建立了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从劳动禀赋结构角度对这个现象进行解释：高技能劳动的相对供给越大，使用高技能产品的工人也越多，那么生产高技能产品的相对利润也越大，这会激励企业研发新的高技能技术，从而促进了高技能增强型技术进步，此称为市场规模效应；高技能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生产高技能产品的利润也越大，这也会促进了高技能增强型技术进步，该效应称为价格效应。可见，相对劳动供给引发的市场规模效应与其诱发的诱致性价格效应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当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相互替代时，市场效应大于价格效应，高技能劳动供给上升将促进高技能增强型技术进步。由于高技能增强型技术进步对高技能劳动需求的提升幅度大于低技能劳动，此时高技能增强型技术进步是偏向高技能的，即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相反，当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互补时，市场效应小于价格效应，高技能劳动供给上升将促进低技能增强型技术进步，此时，低技能增强型技术进步对低技能劳动需求的提升幅度小于高技能劳动，低技能增强型技术进步是偏向低技能的，即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由于1970年代以来，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相互替代，且高技能劳动相对供给上升，因而促进了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和相对工资。

1990年以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极化现象：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的相对就业和工资不断上升，而中等技能劳动的相对就业和工资下降。奥特尔（Autor）等学者对此现象提出一个解释，认为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是互补的，至少是弱互补的，而高技能劳动和中等技能劳动是相互替代的。因此，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高技能劳动的需求，还提高了低技能劳动的需求，但减少了对中等技能劳动的需求，即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极化。

笔者在研究时，更深入一层。既然高、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促进了劳动力市场极化，那是什么原因同时引起了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和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在阿西莫格鲁（Acemoglu）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上建立的三要素模型表明，当高技能劳动与中等技能劳动替代，与低技能劳动互补时，高技能劳动相对中等技能劳动供给的上升将促进高技能

增强型技术进步,此时,高技能增强型技术进步还能提高对低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因此高技能增强型技术进步将同时促进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和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高技能劳动相对低技能劳动上升将促进低技能增强型技术进步,此时也称为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所以,高技能劳动相对供给上升同时促进了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和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但会抑制中等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因而,提升了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但会降低对中等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

笔者又利用 OECD 国家 1970-2007 年的数据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理论,1970-1990 年间,高技能劳动与中低技能劳动存在替代关系,高技能劳动相对供给上升促进了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因而劳动力市场并未出现极化。但 1990-2007 年间,高技能劳动与低技能劳动变为互补关系,高技能劳动相对供给上升促进了高、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但抑制了中等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

2.知识积累视角下的劳动力资本化研究

任洲鸿(曲阜师范大学)

《知识积累与劳动力资本化:一个基础理论模型》,《经济评论》2013 年第 4 期

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劳动的知识化程度不断提高,知识日益成为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独立生产要素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并由此引发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知识生产要素本身的生产越来越服从于以追求价值增值为本质内容的资本逻辑的要求,从而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由物质生产领域向精神生产领域不断渗透和扩张。

在马克思时代,机器大工业的兴起使雇佣工人的“去技能化”趋势日益明显,乃至沦为机器的活的附属物。科学与机器等物质资本一样,都成为统治雇佣工人的异己的力量。所以,在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概念中,雇佣工人与科学知识相互分离,正如雇佣工人与物质生产资料相互分离一样,它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也是马克思所指认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内容。马克思不仅将劳动力成为商品作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起点,也将劳动力商品概念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揭示剩余价值来源的逻辑起点。然而,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劳动力商品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既然包括知识学习、知识转化或转换、知识转移和知识创新等一系列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积累过程,一刻也不能离开知识主体即劳动者的活劳动,那么我们就应当结合知识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深入考察劳动者的知识积累与其劳动力价值增值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政治经济学内涵,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学者迈克尔·波兰尼提出默会知识论,强调除可通过语言、文字、图表等直接表达和交流的言传知识之外,每个人还能掌握和占有大量高度个人化的、

难以交流和与他人共享的个人体验、感悟和技艺等默会知识。新近的研究表明,现代企业中大约 90%的知识是与人相随而行的默会知识。默会知识不仅难以计量,而且是创新的源泉。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知识资本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正是这一经济事实的理论反映。相比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却乏善可陈。然而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以教育、培训和实践(包括“干中学”、“用中学”和互动式学习)等为主要形式的学习劳动,已经成为追求价值增值的生产性劳动。因此,包括劳动者掌握和占有言传知识和默会知识,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等复杂过程的知识积累现象,既是研究和探讨劳动力价值问题时不可忽略的理论视角,也是将传统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发展成为现代劳动力资本化理论的现实基础。

基于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生产结果的分配的基本原理,既然知识生产要素已经成为生产条件的重要内容,那么劳动者掌握和占有知识生产要素的过程(即知识积累),本质上就是生产条件分配状况的演变过程,它必然引发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关系的深刻变革。在知识与劳动者相结合的新的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劳动日益表现为劳动者通过与一定的物质生产资料相结合,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属于其自己的劳动能力(体力和智力)与知识生产要素(由劳动者掌握和占有)的双重经济过程。知识积累决定了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必然处于自我增殖的动态演化过程之中,与劳动者的劳动力一体化增长和不断积累的知识生产要素,也就表现为劳动者的劳动力资本(或可称为劳动者的知识资本)。劳动力资本既可是劳动者的“就业资本”,也可是其“创业资本”。劳动力资本化过程与劳动者通过知识积累实现劳动报酬递增和个人发展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也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历史必由之路。

3. 各国创业差异典型性事实: 基于创业机会来源的解释

毕先萍 张琴 胡珊珊(广西大学)

《创业机会来源研究: 一个创造观和发现观融合的视角》,《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

20世纪70年代以来,创业被公认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各国的创业在类型、表现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转型经济国家的创业机会多,但寻租、腐败等现象比较普遍(汤诺彦等,2010);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创业以生存型为主,创新度低(安诺金等,2011);同为发达国家,美国显示出“高研发-高创业机会-高增长”的势头,而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则是“高研发-低创业机会-低增长”态势(卡森等,2009)。解开上述谜底的关键在于,搞清楚创业机会从何而来。

现有研究显示,创业机会会有多种来源,例如有些机会来自于创新(维卡塔拉曼,2003),有些源于市场失灵(科兹纳,1973)。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创业机会是人们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创造的,创业是一个发现、尝试、修正、适应、学习的过程(科兹纳,1973)。因此,

最全面的研究视角,应该是围绕“机会创造-机会发现-机会开发-开发绩效”这一完整的创业过程来进行。由此,能够整合现有创业机会来源的观点,理解各类创业机会的关系,找到决定各国创业类型差异的关键因素。这一进程大致可概括如下,首先,有风险偏好的创业者为逐利而实施创新(布恩斯托夫,2007),创造出新知识和基于创新的创业机会,使得旧有技术和机会过时(此即为创新的创造性破坏效应),打破原有市场均衡;创新和市场失衡会引起一些企业家的警觉,他们通过模仿创新、开发出更多市场创业机会。机会信息的扩散驱使更多企业进入市场,分享创业利润,直到机会被开发殆尽、利润消失为止,此时市场回归均衡。此后又开展新一轮的创新和机会创造、开发浪潮,如此周而复始。

在上述进程中,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创新的各种表现形式(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影响机理和效应上又各异。因此,各国在创新方面的差异可解释上述创业差异的典型性事实。表现为:

一、技术创新是创业机会的根本来源,但它又具有创造性破坏效应。因此,技术创新能否激发创业活动,要取决于知识技术的性质(田莉、薛红志,2009)。这可用于解释下列事实: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创业质量的差异在于后者自主创新能力弱,只能模仿开发前者的创新型创业机会,创业利润和增长潜力有限。二是针对美日的创业差异,虽然两国都注重研发投入,但美国更注重基础科学和高新技术研发,新技术的突破性、经济价值更强,使创新的创造性效应占优,显著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高质量创业发展。

二、制度安排决定着各类创业活动的相对收益,引导资源主要流向哪些创业机会(鲍莫尔,1990)。因此,制度创新可以降低新知识生产、开发及转化为创业各环节中的创业风险,提高新知识创造及转化为创业机会的效率(卡森等,2009)。如完善的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及政府有限干预能提高寻租、腐败的成本;对创业的财税激励、教育培训等,能提升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和技能等,促进创业机会与创业者的匹配。这可解释成熟市场经济体和转型国家的创业差异: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带来资源配置格局的全面调整,激发出被压抑多年的市场创业机会;但在制度破坏和重构中出现的制度真空和缺陷(杨,2004),为寻租、地下经济等提供了生存空间,可能引发创业行为的变异。因此,转型国家的创业表现能否向成熟市场经济体趋同,将取决于其制度转型能否顺利完成。

上述研究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面临经济发展的关键期,高质量的创业发展,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引擎。为此,我国应全面实施系统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以促进高质量创业机会的创造和开发:一方面,通过改革攻坚战,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完善自由市场和法律制度,降低创新创业风险;另一方面,基于长远视角,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完善技术创新战略,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升新知识开发效率。

中国经济研究

4. 延迟退休一定有损城镇职工养老金利益吗？

刘万（西南政法大学）

《延迟退休一定有损退休利益吗？——基于对城镇职工不同退休年龄养老金财富的考察》，《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

人口老龄化和寿命延长给未来社会养老基金收支平衡将带来巨大挑战，退休年龄延迟作为一项重要的应对措施正被各国广泛使用。中国对退休年龄调整问题的关注已有多年，半个多世纪前制定实施的退休年龄政策已与人口寿命改善状况不相适应，需要加以调整。但现今退休年龄调整正面临“往下阻力较大，往上积极性不够”的实施困境。不久前，相关部门提出的试探性政策建议就激起了社会强烈反应。我们也发现，社会普遍对延迟退休的影响还缺乏正确认识，是构成“延迟”阻力的重要因素。

延迟退休一定会有损退休者利益吗？不少人简单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只会增加缴费年限，延长待遇领取的等待时间，缩短领取年期，而没有看到养老利益也有因延迟退休而得到改进的可能。实际上，从基本养老金的给付模型来看，延迟退休对职工利益的影响取决于养老金参数的不同水平组合，如工资增长率相对于养老金增长率越高，将越有利于延迟退休；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在现有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一方面“延迟”使得养老金替代率“点数”因缴费年限增加而更多，多缴将多得；另一方面延期期间可继续收获到更高的工资增长率，这样计算出来的待遇会更高，使得在整个退休期间，延迟退休者的待遇都会始终高于提前退休者。尽管延迟退休使得待遇领取期缩短、缴费期更长，但这种“利损”可能会因更高的延迟待遇而得到“弥补”。此外，女性劳动者因平均寿命高于男性，其相对较长的待遇领取期使得女性更容易获得延迟退休带来的好处。总之，退休年龄提高后是否一定会有损退休者利益需要综合考察工资增长率、养老金待遇调整、利率等因素，这些因素组合不同，对退休利益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能片面认为延迟退休一定会对职工不利。

为减少延迟政策推行的现实阻力，当延迟确有减少职工利益情形，就应设计合适的待遇计发政策，使得职工一生的养老金利益不会因退休年龄不同而受到“歧视”，做到退休利益在精算上“人人公平”。一方面保证职工个人因身体健康、家庭经济和心理需要灵活地选择退休时间，退休利益亦不受到“歧视性”对待，另一方面保证基本养老金收支平衡不会因职工退休时间不同而受到明显影响。

未来退休政策应尽可能兼顾到退休者利益。何时退休主要是个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强制性地替职工个人做选择。增加退休时间选择弹性是我国退休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不同劳动者在退休待遇、工作与闲暇时间搭配上存在的多样化诉求应该获得尊重。在弹性退休政策下，法定退休年龄应主要体现以下两种形式：一是老年津贴的正常领取年龄。如向所有60岁老人每月提供55元的最低养老金，由于它无须缴费，体现了政府对国民保障所承担的单方面责任，因此领取时间非常严格，不能提前领取。今后调整的法定退休年龄应主要是这

种年龄。二是基本养老金的最低领取年龄。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于此类计划须缴费,强调义务与权利的平衡,所以劳动者满足最低参保缴费年限或工作年限后,可以选择退休时间;为避免过早退休,制度可设定一个最低领取年龄。该年龄应低于老年津贴的正常领取年龄。劳动者只要达到该年龄,可自行决定退休时间,国家不应要求劳动者退休年龄高度一致。

总的来说,在弹性退休制度下,政策制定者应对未来工资增长率和养老金增长率、利率等重要参数有稳定的预期和控制。并借助养老金财富模型计算终生养老金利益,当发现延迟退休的确有损终生养老金利益时,就需要对不同退休年龄的基本养老待遇进行比例性调整,越延迟退休,额外增加的待遇越多。这样基本养老金制度就会自动激励人们选择“延迟”。这种通过制度完善带来的“延迟”诱导效果,应该比政策上统一步调强行延迟所有人的退休年龄的做法要好得多。

5.中国养老保障的路径选择:政府养老与家庭养老相得益彰

江克忠 裴育(南京审计学院)、夏策敏(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和动机研究——基于 CHARLS 数据的证据》,《经济评论》2013 年第 4 期

如何改善规模庞大的老龄人口的福利水平,是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目前虽然已经建立起多层次、多种制度并存的正式养老保障体系,但是,该体系还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大部分老年人口仍游离于正式的养老保障体系之外。截止 2010 年,中国以养老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老年人只有 24.1%,而且城乡之间差异显著。二是正式养老保障水平较低,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1999-2011 年,中国企业养老金的替代率由 69.18%下降到 42.9%,目前已经低于国际警戒线 50%替代率水平的标准;2009 年开始试点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替代率仅为 20%。三是正式养老保障资金面临巨大的缺口。其中,2011 年,中国 14 个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亏空 767 亿元,个人账户空帐高达 2.2 万亿元。

在欧洲高福利国家,人口老龄化一方面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完全由政府提供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却将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殆尽,并招致财政危机与代际冲突,“把家庭找回来”反而成了重要的制度安排(彭希哲、胡湛,2011)。作为发展中国家,考虑到所面临的财政和经济风险,面对来势凶猛的老龄化挑战,以及基于欧洲高福利国家养老保障的经验教训,就政策选择而言,未来政府养老保障体系的主要特征应该是:广覆盖、低水平(郑秉文,2011;封进、何立新,2012)。所以,在中国的现在和将来,由政府提供的正式养老保障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家庭养老还必须长期共存,互相补充。

在政府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以及政府养老保障与家庭养老需要长期共存的背景下,有关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和动机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原因在于:政府养老保障可能对家庭养老产生“挤出”或“挤入”效应(Becker, 1974; Cox, 1987)。其中,如果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帮助受无私动机驱动,则家庭的代际转移可能被政府养老保障所代替,即所谓的“挤出”效应,政府的制度安排有可能偏离其目标;反之,如果子女对父母的经济帮助受交换动机驱动,则政府养老保障会刺激家庭代际转移的规模,即所谓的“挤入”效应,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会得到显著改善。

我们利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项目2008年的先导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代际转移呈现向上转移和隔代向下转移的特征,即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人获得子女不菲的经济帮助,老年人对孙辈提供经济帮助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成年子女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规模与父母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拒绝了无私动机假说,而支持了交换动机假说;即政府养老保障不会对家庭代际转移产生“挤出”效应,而会产生“挤入”效应。所以,未来加大政府养老保障的范围和力度,同时创造条件促进子女对老年父母提供经济帮助,可以共同有效改善老年人的福利水平。同时,研究还发现,相对于城镇户籍的子女,农村户籍的子女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显著较低;子女教育水平越高,其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也越高;相对于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在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甘肃省,子女家庭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较低。说明子女家庭经济状况是制约其是否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重要影响因素。老年人子女越多,各子女家庭对其提供经济帮助的概率也越高;在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和少子化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家庭养老面临严重挑战。

6.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户收入? ——基于中国家计调查的分析

周晔馨(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资本在农户收入中的作用——基于中国家计调查(CHIPS2002)的证据》,
《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

关于农户收入的决定因素,既有研究更多地关注了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而忽略了社会资本的作用。布尔迪厄(Bourdieu)、科尔曼(Coleman)和普特兰(Putnam)等提出并发展了社会资本概念以来,不断有文献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农村家庭的收入和福利等问题,甚至有经济学家提出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但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以及收入结构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仍然知之甚少。

笔者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S2002),研究了村和家庭两个层面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社会资本可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对于村庄层面的社会资本,使用村级的关系融洽程度作为代理变量。对于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使用家庭间的互惠规范和家庭的社会网络来表征,前者包括家庭的送礼支出金额和亲邻帮工天数,后者包括家庭是否有在城市生活或当干部的亲戚来代表的社会网络异质性以及农户参加的经济组织种类数。

经过分析发现,村级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很显著,而且主要是增加非农业收入。村内的

融洽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对农村家庭年纯总收入增加的幅度接近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1000 元的作用, 或约等于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半年的作用。从影响收入的渠道来看, 虽然融洽程度对农业收入影响不显著, 但对非农业收入影响显著, 每提高一个融洽等级相当于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 1 年。

家庭社会资本也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并且各维度对不同的收入来源有不同影响。家庭的礼金支出对于农业收入的影响较大, 对非农收入也有更大的促进。农业合作规范对农业收入的影响为正, 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为负。经济组织参与程度对家庭年总收入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 并且主要通过农业收入来增加, 但对非农收入则没有影响。城市社会网络对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年总收入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 对农业收入影响显著, 但对非农业收入则很显著, 这主要因为网络异质性有利于带来非农收入机会。

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进一步猜想社会资本在整体上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构建社会资本综合指数之后, 通过回归分析, 研究发现该指数的一个标准差变化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大大高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个标准差变化的作用。

除了直接影响, 村和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之间, 以及社会资本各维度与物质、人力资本之间的共同作用也对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第一, 村庄融洽关系带来的信息流动配合城市亲友网络的帮助, 在提高非农收入上有较强的互补性。第二, 村级社会资本和家庭物质资本的交互作用能增加非农业收入, 村级社会资本和家庭人力资本在间接增加农户总收入的过程中有互补性, 但回报率较低。第三, 家庭社会资本可以从多方面影响物质资本回报率, 农户的人力资本可以在参与社会经济组织中促进农业收入同时显著减少非农业收入, 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的亲友网络的交互作用对总收入影响不显著, 但对农业收入负向影响显著。

社会资本的这些特征体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时代特点。以上实证研究结论, 对我国转型期农村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首先, 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的重要影响甚至不亚于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 这提醒我们应改变以往只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这些传统意义上的资本而忽视社会资本的惯性思维。其次, 应该根据不同目的来利用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比如, 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 应该注重村级社会资本和个人的社会异质性网络的培育; 在农村发展农业产业的过程中, 应促进对社会经济组织的培养并鼓励农民参与适当的组织。最后, 应该注意社会资本之间以及社会资本和物质、人力资本之间的配合, 以取得政策的最优效果。

7. 大学毕业生地区间流动预期对失业、收入及人力资本的影响

王云多 (黑龙江大学), 《经济评论》2013 年第 4 期

受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影响, 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加, 由于在一定的时期内, 劳动力市场对大学毕业生吸纳能力有限, 导致大学毕业生失业规模急剧膨胀, 尽管其影响因素较为复杂, 但地区间流动不充分是大学生失业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 从流动预期 (流动概

率)视角出发,考察地区间流动预期对大学生失业和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影响,对于促进大学生就业,优化地区间人力资源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尤为重要。

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经济发达地区不仅平均工资水平要高于落后地区,而且经济发达地区往往能够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因此,发达地区对大学毕业生产生强大的拉力,经济落后地区大学毕业生通常会根据预期流动后收入和就业机会情况,适时选择由经济落后地区流入经济发达地区。

理论分析表明,往往到迁入地(发达地区)的工作机率越大,迁入地(发达地区)和迁出地(落后地区)工资收入差距越大,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越严重。此外,流动预期(流动机率)也影响到大学生保留工资,导致保留工资随流动概率增加而增加,随迁出地工资水平增加而减少,这意味着个人在落后地区劳动力市场保留工资随到发达地区工作概率和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工资收入差距增加而增加,结果,落后地区失业率随保留工资上升而增加,当存在流动可能性时,落后地区取得大学文凭的预期收入随着流动概率的上升而增加。

是否流动概率提高将导致落后地区受高等教育人数增加?针对这一问题,受个人能力和教育背景不同影响,考虑到接受大学教育需要付出的学杂费等直接成本以及放弃的收入等间接成本,每个人接受大学教育的成本也不同。当获得大学文凭的预期收入与未读大学预期收入之差大于获得大学文凭的成本时,个人才会选择接受大学教育。研究表明,由于落后地区大学生流动预期的提高,落后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会提高。人才流动性越强的地区,个人越能获得接收大学教育带来的高收益,个体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也越大,大学毕业生数量迅速增加,进一步提升社会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为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除了理论分析流动预期对大学生失业、收入及人力资本的影响,更需要从经验上去检验理论是否正确。基于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毕业生求职情况的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两点结论:首先,大学生失业规模与流动预期之间存在正向联系。由于预期迁入地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水平,在迁入地(发达地区)得不到工作机会的大学毕业生将不会立即工作,他们将选择进入失业状态,以便不断尝试寻求一份发达地区的工作,导致短期内大学毕业生失业规模扩大。其次,受流动预期影响,求职时间长短,通过求职者保留工资的变化影响大学毕业生失业规模。数据分析揭示,个人在迁出地劳动力市场保留工资随到迁入地工作概率上升而增加,而个人选择短期失业是对迁入地高工资预期的回应。随着大学毕业生寻找工作时间(失业时间)的延长,总体上保留工资趋于下降,就业量会增加。此外,经验研究表明,地区间和城乡间大学毕业生失业情况类似,随着寻找工作时间的延长,保留工资都在下降,而失业规模也在逐渐缩小。

就如何促进大学生就业而言,建议政府应积极引导大学生就业,为大学生就业搭建信息平台,提供信息服务和就业指导。政府应打破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地区和行业因素,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优化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和行业间配置。大学生在就业中也应适时调整自己的预期,避免求职时间过长导致的人力资本折旧和劳动力资源浪费。

8.“污染避难所”在中国是否存在？

侯伟丽 方浪（武汉大学）、刘硕（北京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

从理论上讲，企业成本加大往往意味着市场竞争力的削弱。政府加强环境管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在环境管制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下，如果一地政府加强管制，实施了比其贸易伙伴更严格的环境标准，这个地区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将增加，在市场上将会因产品价格相对较高而失去竞争优势。这样，在生产要素流动日益自由化的今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选择到环境管制标准较低的地区落脚，使这些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一些工业行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较高（如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称为污染密集型产业），与其他行业相比，他们进行污染防治往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因此也更易受到政府环境管制的影响而迁移。

我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地区不平衡，在环境管理的严格程度和环境标准的高低上也存在地区不平衡。一些调查发现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企业正在以产业梯度转移的名义向中西部地区迁移。探讨环境管制因素是否是产业转移的显著影响因素有助于更好认识产业跨区域转移，对调整环境政策、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检验我国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我们使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1996-2010年间各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数据，结果证实了该效应的存在，但由于企业对环境管制变化做出反应有一个过程，“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完全显现存在一定的滞后期。此外，分析结果也显示市场发展潜力大、产业集聚程度高、基础设施条件好的地区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吸引力强，而经济发展水平高、劳动力工资水平高的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趋于向外转移。

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地区工业结构变化呈现一定的规律。2002年以来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期，工业结构重化工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另一方面，社会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中央政府对环境问题更加重视，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思想，对各地方政府的环境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地区也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环境管制强度。我们检验了2002年前后两个时间段“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强度，发现后一时期“污染避难所”效应更大，产业集聚程度、市场发展潜力等因素的作用力度也加强了。随着我国整体工业结构向重化工化方向发展，环境管制和产业集聚两个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产生越来越大的共同影响，其结果会使环境管制较严格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向外迁出，而环境管制较宽松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越来越聚集，因此会形成一些污染“热点”地区，这些“热点”地区倾向于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省区。

“污染避难所”效应之所以在我国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我们认为其形成原因有二：其一，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能在内部有效吸收环境管制带来的成本压力，成本竞争是竞争的主要形式；其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迫使污染密集型产业向区外转移。与之相对应，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急于发展经济，吸引了污染密集型产业进入。为了抑制“污染避难所”现象在中国的继续发展，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地区

环境管制措施的管理和规范,在对区际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要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区际主体功能区划,对各地相同的功能区的环境管制措施进行规范统一,减少区际间环境管制力度差异的“漏洞”。另一方面需要支持企业进行技术研发,以技术创新带来的收益增加冲抵环境管制带来的成本增加,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使企业摆脱过度依靠低成本参与市场竞争的局面。

9.关于我国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随机收敛检验

杨骞 刘华军(山东财经大学)

《中国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随机收敛研究——基于两类碳排放指标的再检验》,《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

国家的“十二五”规划已明确了201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要比“十一五”末降低17%。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制定标志着低碳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我国幅员广阔,二氧化碳排在地区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许广月,2010;刘华军、赵浩,2012),那么中国地区二氧化碳排放是否存在收敛,换言之,二氧化碳排放的地区差异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对以上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我们精确掌握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演变规律,从而为政府合理分解二氧化碳减排任务、制定差异性的区域减排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目前对中国地区二氧化碳排放收敛的检验多是采用传统的收敛检验方法,如 σ 收敛、 β 收敛和俱乐部收敛(许广月,2010;林伯强、黄光晓,2011;杨骞、刘华军,2012;等),而基于随机收敛视角对地区二氧化碳排放收敛的研究较少。随机收敛能够检验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在长期内是否存在持续冲击,从而避免短期内可能存在的收敛与非收敛之间的状态。根据卡利诺和米尔斯(1993,1996)所提出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根据检验结果,若存在单位根则二氧化碳排在地区之间是发散的;反之,若不存在单位根即平稳,则表明二氧化碳在地区之间是收敛的。

通过采用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两类碳排放指标,运用多种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单变量单位根检验方法,我们对中国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全局性随机收敛和俱乐部随机收敛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两类碳排放指标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均表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未呈现出全局性随机收敛趋势。同时,单变量单位根检验也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相对碳强度和相对人均碳排放序列呈现确定性收敛趋势。此外,两类碳排放指标在三大地区和八大地区内部均未呈现俱乐部随机收敛。

以上研究结论隐含着中国各地区二氧化碳排放最终不会自动收敛到某一个平均水平,即地区碳排放之间的差异不会随时间推移而将会在长期内存在。由于二氧化碳主要由化石能源消耗而产生,因此造成二氧化碳排放呈发散而非收敛最为关键的原因,可能在于地区之间能源消费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由于化石能源的丰裕程度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那些

化石能源丰裕的地区往往倾向于消费更多的化石能源，从而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而那些化石能源相对短缺的地区只能利用其他非能源要素比如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劳动来对能源要素进行替代，从而消耗相对较少的能源而排放相对少的二氧化碳。另一方面，二氧化碳排放除了受到能源消费影响外，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对外贸易等方面差异的长期存在，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地区差异也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二氧化碳排放呈发散而非收敛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充分考虑碳排放地区分布差异的基础上，制定因地制宜的碳减排政策。

10. 对外反倾销措施能否改善中国企业绩效？——以化工产品“双酚 A”案件为例 苏振东 邵莹（大连理工大学），《经济评论》2013 年第 4 期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鉴于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以及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部分国外企业采用不正当的市场倾销手段，大力排挤与之竞争的国内进口竞争性企业，从而给中国相关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根据WTO对全球反倾销数据，自1997年发起的第一宗案例截止到2012年，中国共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197起，其中中国化工行业诉讼案件占全部案件数量高达80%。因此，反倾销措施是否能够真正改善中国受保护企业绩效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以化工产品“双酚A”案件为例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在中国，双酚A产业起步晚、规模小，生产装置的局限和生产工艺的落后导致巨大的国内供需缺口，进而导致双酚A产品的进口量快速增长。在调查期内进口双酚A产品占中国大陆市场份额40%以上并持续呈上升趋势。由于进口双酚A产品占中国大陆市场份额较大，其进口价格对中国大陆同类产品销售价格起主导作用，压低了中国大陆同类产品销售价格。为维护国内双酚A市场贸易秩序，保持国内双酚A产业的正常发展，中国商务部自2007年3月22日起对原产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进口双酚A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除按现行规定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外，还征收反倾销保证金及相应的进口环节增值税保证金。

针对中国对上述四国发起的进口双酚A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我们从异质性企业视角出发，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PSM方法）定量考察对外反倾销对中国受保护企业的实际救济效果。深入研究受保护的产业内的微观企业绩效（不仅包括“劳动生产率”指标，而且还包括成本、利润率等指标在内的企业整体绩效状况）。定量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反倾销措施显著提高了国内双酚A生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工业企业成本、利润率和资产负债率四个方面，由此可知，对外反倾销措施确实明显提高了国内双酚A产业内受保护企业的绩效。

基于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在政府层面上，鉴于对外反倾销措施在改善国内进口竞争性企业绩效方面确实起到了正面作用，我国政府应在WTO框架内积极合理利用反倾销这一有力武器打击国外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不正当倾销行为，保护国内进口竞争性企业的正常发展。其次，进一步完善中

国反倾销法律体系，切实维护中国受损企业利益。

第二，在行业层面上，基于中国市场巨大和中国化工业体系发展不合理等原因，中国化工行业一直是中国对外反倾销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应该发挥行业协会力量加强协作共同抵御国外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另一方面，政府应当扶持发展潜力巨大的一些企业，充分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作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

第三，在企业层面上，由于相关企业提出反倾销申诉时，被诉企业可能暂时减少对华出口、甚至彻底退出国内市场，此时缺乏国外企业的强有力竞争，在位企业可能缺乏技术创新、提升劳动生产率、最终增加企业利润率的动力，不能充分利用政策所提供的这一宝贵休整时期培育企业市场竞争力，因此政府应重视受保护企业的长远发展问题，应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措施，鼓励企业主动技术创新活动和加强研发创新能力、切实提高包括劳动生产率在内的企业绩效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

11. 国际边界效应比国内边界效应大吗？

洪勇（江西财经大学）

《中国国内与国际边界效应比较研究》，《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

边界效应是指当贸易发生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地区时，地理边界对贸易有阻碍作用，会显著降低跨越边界的贸易量。通常贸易按地理空间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即：省内贸易、省际贸易和国际贸易。当贸易发生在一省内部时，此时贸易并没有跨越任何边界，因此省内贸易不会受到边界效应的影响；当贸易发生在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时，此时贸易需要跨越省际边界（国内边界），国内边界效应就会发生作用；当贸易发生在不同国家之间时，此时贸易需要跨越国际边界，国际边界效应就会起作用。那么一国的国际边界效应和国内边界效应孰大孰小呢？

国际边界效应的大小可以通过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比较得到，而国内边界效应的大小则可以通过省内贸易与省际贸易（国内贸易）的比较而得到。笔者利用2007年的相关数据，在引力模型的框架下对中国国内、国际边界效应进行了联合分析，结果表明，省内贸易大约是国内贸易的63倍，而国内贸易约为国际贸易的9.5倍，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内边界效应比国际边界效应要大，这也表明相对于国内贸易而言，与跨越中国的国际边界进行贸易相比，跨越中国国内边界进行贸易时需要克服更高的壁垒。为了使结果更为可靠，笔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从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来看，虽然国内、国际边界效应估计结果会随着观测样本、模型解释变量和距离函数形式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变化都非常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不管观测样本、模型解释变量和距离函数形式怎么变化都不改变国内边界效应大于国际边界效应这一结论，国内边界效应比国际边界效应大意味着省内贸易与国内贸易之比的倍数高于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比的倍数，这表明省内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是最高的，因此，国内边界效应较大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便是：贸易更多地发生在一个省的内部，换句话

说, 贸易具有本地化偏好。

造成中国贸易本地化偏好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 处于同一产业链上的企业为了节约运输成本、缩短生产周期、分享外部规模经济的好处, 他们通常会扎堆选址, 形成集聚效应; 第二, 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 各地区对热点产业通常是一拥而上, 而不是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进行合理的产业结构布局; 第三, 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具有内在激励和扩展的冲动, 这使得人为造成的市场分割现象比较普遍, 各地方政府通常出于维护本地区利益的目的, 出台众多地方保护主义政策; 第四, 分处在不同地区的企业由于从未谋面, 相互之间不了解, 造成了双方缺乏对彼此的信任感。

更开放的贸易能够带来更多的福利, 本地贸易所占比重越高, 本地区从贸易中所获得的福利就越少, 为了获得更多的贸易福利, 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除了应该继续推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外, 还应该出台各项措施努力提高国内省际贸易的比重。首先, 中央政府应该从全局出发, 站在更高的层面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状况合理制定全国性产业布局的总体规划, 指导各地方产业布局的制定和调整, 努力形成互补型而非替代型的全国产业结构布局以避免重复建设; 其次, 各级地方政府应该高瞻远瞩, 摒弃本地思维, 废除已实施的各项地方保护主义政策, 尽量减少对本地市场的人为分割与封锁; 再次, 建立并逐渐完善全国企业的信用体系并予以公开, 使不同地区的企业不会因为彼此缺乏信任感而放弃原本可以开展的省际贸易; 最后, 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特别是要加大对铁路、公路、机场、码头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 这会降低省际间的贸易成本特别是运输成本以促进跨省贸易的开展。

12. 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波动平稳化

詹新宇 甘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评论》2013 年第 4 期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宏观经济现象中, 有两大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由第一产业为主导逐步向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变; 二是经济波动幅度显著下降, 特别是在“九五”时期出现了由“高位波动”转向“波幅收窄”的平稳化趋势。产业结构升级是内部结构问题, 而经济波动是总量增长率的变动问题, 宏观经济波动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表现形式, 而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和频率,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速度。为此, 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入手, 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机制,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 引入产业结构升级因素之后, 发现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模拟结果整体上优于不考虑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可见, 在模型化中国经济波动的研究时, 对产业结构升级因素的忽视将会降低模型对现实经济波动的拟合能力。

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敏感性分析, 发现随着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加快, 模型稳态时的消费产出比出现单调下降, 而投资产出比出现单调上升。这表明, 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加快会

促使消费的相对下降和投资的相对上升，这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波动的典型事实是相符的。与此同时，消费和投资相对于产出的波动也出现了单调变化：消费的相对波动由 185.66% 锐减至 35.95%，投资的相对波动则由 130.99% 上升至 157.63%。敏感度分析较好地明确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的加快，使得稳态经济中需要更多的投资，投资相对增长，消费因而相对减少；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促使投资在维持高增长的同时，也呈现高波动的特征，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消费结构升级，并使得消费波动逐渐趋稳。可见，消费需求的波动缓和了产出波动而投资需求的波动加剧了产出波动，二者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抵消效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渐转变，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进程的逐渐加快将是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并促使消费相对波动日趋缓和，这可能是近些年来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熨平效应的作用机制。

为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冲击作用的动态传导机制，假定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不是恒定的，在某个时期发生了 1 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利用脉冲响应分析这种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正向冲击对投资、消费、产出和资本存量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动态影响。比较这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冲击的脉冲反应发现，投资波动偏离稳态的幅度最大，其次是实际产出和资本存量，而消费最小。产业结构升级冲击使得投资产生较大的正向波动，但同时使得消费产生负向波动，这两种波动效应共同作用，最终使得总产出的波动不是很大，这也与敏感度分析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变动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冲击源，宏观产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周期波动有着深刻的影响。当前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都面临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和恢复经济增长的压力，中国经济也正处在打造“升级版”、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关键阶段，面对竞争激烈程度加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要素成本上升较快等国内外经济形势，为实现“稳增长”（即经济波动较小）与产业结构调整协调推进，必须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性地位，做强做优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3. 消除税收背离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李建军（西南财经大学）

《税收背离与地区间财力差异》，《经济评论》2013 年第 4 期

实现中国梦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最强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每个公民享有数量大致相同、质量大致相近、可及性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每个人共享发展成果，公平追求幸福生活，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和要求。要实现教育、医疗卫生、安全秩序、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各地用于提供各项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大致相等，实现地区间财力大致均等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必要条件。然而,就现实而言,我国地区间财力差距巨大,如2010年上海市人均财政收入12483.5元,贵州省为1536.1,前者为后者的8倍以上,地区间的财力不均等造成了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

除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外,税源与税收的背离也是造成地区间财力差异,公共服务非均等的重要原因。税收不是无本之木,不会凭空产生,税收来自于税源,如个人收入、企业盈利、销售额等。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地区的税收和税源应该是一致的,有税源则有税收、税源多则税收多;反之,无税源则无税收、税源少则税收少。所谓税收背离,是指产生税源的地区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税收,没有产生税源的地区却获得了产生于其他税源地的税收,税收与税源的非一致性和不匹配现象。税源与税收的背离的直接结果是不同地区税务机关征得的税收与基于税源、税基的应征税收不一致和扭曲,造成了地区间财力的非正常转移和税收分配的不公,加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

根据测算,在现行税收征管和分配制度下,2010年,上海、北京、广东、海南、云南和天津等地是税收背离的受益地,因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项税收的税收背离而多得税收分别为952.88亿、774.75亿、204.7亿、66.66亿、90.49亿和56.53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河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福建和江西等地为三税税收背离的主要税收流出地和受损地,其因税收背离而少得税收分别为658.11亿、418.4亿、324.78亿、287.1亿、207.44亿、145.69亿、133.99亿、122.43亿、128.46亿和83.99亿。若消除三税种税收背离对地区财政收支的影响,地区间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的差距将有较大幅度的缩小。

税收背离所产生的地区间的税收流入和税收流出,其结果总体上是,税收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税收背离是地区间财力差异的重要来源,减轻和消除当前严重的税源与税收背离现象,是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构建公正合理的横向财政税收分权、分配制度的内在要求。解决税收背离问题,有纵向调整和横向调整两种模式。其一,纵向调整。在中央与地方纵向税收分配中,对税收流入地,提高中央税收分配比例,对税收流出地,降低中央税收分配比例,并通过中央层面财政转移,使税收背离的税收流入地税收向税收流出地转移,以矫正税收背离的影响。其二、横向调整。基于征管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配置税收征管权,并根据税源和税基所在地的空间分布,按一定比例和权重在地区间分配征得的税收;同时,设置设立专业、独立、权威的跨区域税收协调机构,如在国家税务总局、省税务局内分别设置国内税收协调委员会和区域税收协调办公室来分别负责跨省、省域内的跨区域税收征管和分配协调工作。无论是纵向调整模式,还是横向调整模式,或者两者结合都是解决税收背离问题的重要可选途径和方式。在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中,相对于通常的转移支付机制,减轻或消除税收背离是通过地区间税收分配方式的拨乱反正和科学、合理回归的途径来促成的,可以改变通常转移支付方式产生的一些地区对另一些地区无偿帮助和支援的错觉和摩擦。

14. 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功能：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微观分析

谢军（华南师范大学）、黄志忠（南京大学）、何翠茹（华南师范大学）

《宏观货币政策和企业金融生态环境优化——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

企业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的投资和融资活动具有重大影响。一个良好宽松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企业的投资扩张和转型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是帮助企业由内源型融资模式向外延型融资模式转型的关键因素。宽松的金融生态环境会减弱企业的融资约束，并通过提供外部融资支持企业的投资行为，帮助企业把握投资机会。而紧缩的金融生态环境会强化企业的融资约束，并抑制企业的投资行为，甚至迫使企业放弃投资机会。我们试图通过对企业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的测度考察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和融资约束的积极效应，并进而评估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功能。研究一方面为宏观货币政策在优化企业金融生态环境和缓解公司融资约束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另一方面为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所产生的投资驱动效应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

我们从理论上探讨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功能，并运用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

在理论分析上，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视角，我们构建了一个描述宏观货币政策如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如何优化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数理经济学模型。该理论模型认为，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措施能够通过信贷投放降低企业外部融资成本，并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低成本外部融资渠道，从而降低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性，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扩大和改善企业投资支出，优化企业金融生态环境。我们的理论模型还显示：由于国有企业经常受惠于银行信贷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更大程度地降低非国有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非国有企业能够从宽松的货币政策获得更明显的融资优惠），进而更显著地缓解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

在实证检验中，我们根据理论模型的推论设计了相应的计量模型，并利用2002-2010年间的季度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研究假设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重点考察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缓解效应，并据此评价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功能。实证研究的经验结果显示：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会对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能够更大程度地降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这意味着，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降低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性，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

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投资显著依赖于内部现金流（这一发现支持了传统的企业融资约束理论）；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企业扩张投资，通过降低企业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缓解了

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了企业金融生态环境;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和融资约束对宏观货币政策具有更大的弹性,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能够更大程度地缓解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并更有效地改善非国有企业的金融生态环境。经验证据表明:货币政策仍然是激励企业投资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优化生态环境的关键宏观调控工具。该研究发认为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提供了企业投融资层面的微观证据。

15. 新股发行周期影响上市公司质量吗?

胡志强 陈钰君 王一竹(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

新股发行问题始终是市场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新股发行市场上存在着大量公司在一段时间集中发行,而在另一段时间发行量萎缩甚至停滞的现象,称为IPO浪潮。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的新股发行市场上广泛存在,导致了新股发行数量的周期性波动,形成热销市场和冷发市场的交替。从我国新股发行市场的现实来看,也存在这种现象。导致新股发行周期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试图揭示其成因。但是,对于投资者更为关注的现实问题——新股发行周期是否影响上市公司质量却少有触及。因此,在已有的新股发行周期的研究框架下,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研究新股发行周期对上市公司质量的影响就变得更具有实际意义了。

我国IPO市场与国外成熟市场有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IPO的最终核准权在政府手中,不管是2001年以前的审批制,还是之后的核准制,政府对公司能否上市并发行都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其次,与国外公司不同,中国大多数公司管理层都非常热衷于通过公开发行上市来融资;再次,中国股市上的投资者还不成熟,非理性的个人投资者仍占较大比例。据此,我们构建模型,并选取1993-2010年我国A股市场的IPO数据进行分析和实证研究。

通过扩展现有IPO浪潮的研究,关注IPO浪潮中的上市公司质量差异,并加入监管者的角色和市场参与者的特点,结合实际来研究中国IPO市场的周期,从而得出结论:第一,对私有企业资本需求的外部冲击会导致IPO浪潮的形成,而在中小板市场中也同样存在着IPO浪潮现象,但并不是由外部经济冲击所引起的;第二,在热销市场中上市的公司质量的离散性比冷发市场中的要大,也就是说热销市场中上市的公司质量要比冷发市场的差,这说明了新股发行周期对上市公司质量有影响;第三,在热销市场中,公司股票收益率的波动性是由IPO效应驱动的,而不是IPO浪潮中所有股票的整体现象;第四,在热销市场中上市的公司实施ST和退市的比率几乎是冷发市场上的3倍,这进一步说明了新股发行周期对上市公司质量的影响。

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由于我国市场参与者的特点,外部经济冲击更容易导致低质量的公司热销市场中上市,使得热销市场中上市的公司质量参差不齐,这就很容易使广大投资者蒙受损失,也会降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故在IPO热销市场时,政府应

该加大监管力度,严格执行甚至提高发行标准,防止那些低质量公司用粉饰报表等方式来达到上市的要求。第二,我国的发行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核准制决定了监管机构的权力非常大,而保荐人制度也非常倚重保荐人的素质,在相应的监督配套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寻租行为和道德风险。因而,在加强对公司监督的同时,还应当逐步完善相应的监督配套机制。第三,只有广大投资者逐渐成熟起来,懂得辨别哪些公司值得投资,哪些公司不值得投资,才能真正减少低质量公司的 IPO 动机。第四,由于外部经济冲击对中小板市场的热销或者冷发影响很小,所以在经济下行时应当大力支持以民营、高科技企业为主的中小板企业发展,以提升资本市场的效率;此外,投资者也可以在此期间将投资重点放在中小板企业上以克服新股发行周期的影响。

16. 引入杠杆率限制能遏制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吗?

沈庆劼(天津财经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

监管资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是金融机构在不违背资本监管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某种金融设计,在不改变其实际风险水平的情况下降低监管资本要求的行为。监管资本套利产生于资本监管框架的缺陷,根源于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不一致性。监管资本是监管部门规定商业银行所必须持有的最低资本数量,经济资本是在不存在监管资本规定的情况下银行自身的最优资本数量。出于金融稳定等社会性因素的考虑,监管部门往往要求商业银行持有比其自身最优资本数量更多的资本。由于税收、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的存在,资本成本必然大于负债成本。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这种差距被商业银行视为监管税收。就像面对其他税收一样,银行也会设法降低监管税收,于是便产生了监管资本套利的动机。

1998年Basel I推出以来,作为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监管资本套利在西方发达国家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次贷危机爆发前5年,欧美主要商业银行的总资产翻了一番,而用来计算资本充足率的风险加权资产仅仅上升了大约25%,且直到危机前夕,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多在10%以上,远远高于监管部门8%的最低要求。表面安全的数据下面却蕴藏着巨大的风险,这说明商业银行可能进行了大量的监管资本套利,资本监管效率已被严重削弱。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2010年发布的Basel III决定引入杠杆率限制,规定2013年开始执行,2018年全部达标;中国银监会2011年发布《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引入杠杆率,并规定于2012年开始执行,2016年全部达标。杠杆率不具风险敏感性,是Basel I颁布之前各国资本监管较为常用的指标,所以与其说是引入,不如说是回归。在Basel III颁布之前,一些国家一直执行着杠杆率监管,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前者虽然实施了杠杆率,但依然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后者被普遍认为正是由于杠杆率的执行,才避免了此次危机。国际经验未能对杠杆率的作用作出一致的判断。巴塞尔委员会以及中国银监会希望通过将杠杆率限制作为内评法的补充,以遏制商业银行的监管资本套利行为。但对于该目的是

否能够实现，各国学者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陈梦雯等（2011）讨论了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结合的影响，指出当资本充足率要求更严格时，实际上是在执行资本充足率；当杠杆率监管更严格时，实际上又是在执行杠杆率。并将鼓励银行持有风险资产，无法遏制监管资本套利。黄海波等（2012）运用线性规划方法说明，得出了与陈文同样的结论，并指出杠杆率监管不但不能阻止监管资本套利，反而会滋生商业银行从低风险资产向高风险资产转换的监管资本套利行为，杠杆率监管是在顺周期性与管理资本套利之间的一种权衡。陈文与黄文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对杠杆率监管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章，但他们都未考虑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笔者赞同 Basel III 与中国银监会引入杠杆率限制作为内评法补充的决定。研究表明，在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引入杠杆率限制有助于遏制监管资本套利，其将通过两条路径发挥作用：第一，降低了商业银行有限责任制度所带来的卖权的价值。对于高风险的银行而言，被迫持有数量一定的最低资本，使其在危机发生以后，至少需要用这些资本去承担部分危机带来的社会损失，从而降低了监管资本套利的收益水平。第二，增加了商业银行因监管资本套利而被惩罚的威慑力。杠杆率所要求的最低资本数量，保证了其监管资本套利行为被甄别后可能被惩罚的程度，从而保证了惩罚制度的威慑力。杠杆率监管是对内评法下监管部门甄别能力的补充，甄别能力越低，所需的杠杆率要求越高。两种极端情况是，如果监管部门具有完备的甄别能力，则内评法本身可以有效遏制监管资本套利，无需引入杠杆率；如果监管部门不具有任何甄别能力，则内评法完全失效，仅需使用杠杆率监管。引入杠杆率监管也是有成本的，表现为要求低风险银行持有比最优水平更多的资本，无论从商业银行个体角度还是社会整体角度考虑，这都是一种资本的浪费。所以实际操作中应权衡考虑遏制监管资本套利与节约资本成本两个方面。

17. 个体投资者风格偏好转换与股票收益

胡昌生 王永锋 池阳春（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3 年第 4 期

金融市场中，个体投资者是典型的噪音交易者，他们在解读基本面信息时常采用启发式的思维方式（heuristics）走捷径。在交易决策时，个体投资者倾向于把市场中股票按特定的特征进行分类，从而形成不同的投资风格（巴布瑞思、史莱弗，2003；巴布瑞思、史莱弗和武格勒，2005）。显然，这种启发式的决策是投资者非理性特征的重要表现。由于投资者的非理性具有系统性，因此，个体投资者在总体上会表现出风格偏好。在我国，市场中的个体投资者至少存在着三种显著的风格偏好：规模、账市比和动量。这三个因素都构成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的系统性因素，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个体投资者的风格投资中寻找新的研究线索。

具体地，在个体投资者风格偏好转换中，个体投资者对三种风格组合对（小盘股和大盘股，成长股和价值股，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的超额持仓比例表现出了强负相关性，呈现出显著的风格偏好转换特征。当个体投资者对某一风格组合（如小盘股）的预期更加乐观而持

有更多,则他们对相反风格组合(如大盘股)的预期会趋于悲观而降低持仓比例,他们对不同风格组合的偏好在样本期内不断此涨彼落(两风格组合超额持仓比例的相关系数为 -0.8248)。个体投资者对不同风格组合偏好的敏感性存在差异,小盘股和大盘股、成长股和价值股的超额持仓变动趋势在持续较长时间后才发生逆转,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的变化趋势只维持很短的时间,这说明投资者对不同风格的关注度是不同的,其交易行为更易受到市场价格信号的影响。

要考察个体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一是看其风格偏好是否由基本面驱动;二是看风格投资组合与个体投资者交易的相关性。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个体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不太关注宏观基本面信息,主要受到市场价格信号的诱导,基本因素对个体投资者的风格偏好没有显著的影响;个体投资者的风格投资会影响风格投资组合的收益,并对同一风格的不同极端组合,影响方向相反。在以月度为单位的期间水平上,个体投资者受短视性损失厌恶或处置效应的影响(处置效应,意指个体投资者在盈利时倾向于迅速兑现利润,而在亏损时为避免兑现损失而继续持有),卖出前期上涨的股票,买入前期下跌的股票,表现出负反馈的特征。这意味着,个体投资者的风格投资也是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的系统性因素之一。总之,市场价格行为对个体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产生影响,个体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反过来也对市场价格产生了影响。

证券市场的投资风格呈现出多样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个体投资者的交易决策如何在同一风格之内和不同风格之间进行转换的,即,风格之内的竞争和风格之间的竞争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风格之内的竞争,除了资产的前期收益之外,赌博偏好(巴布瑞思、黄,2008)、实现效用(巴布瑞思、熊,2012)等都可能构成影响因素。而对于后者,则主要涉及到投资者对于不同投资风格的关注度问题(巴布、奥汀,2008)。由于投资者对不同的风格特征所赋予的权重不一样,不同风格所表现出来的与收益的反馈关系在强度上也会有差异。例如,投资者以前期收益决定风格之内的竞争,如果投资者更关注于资产的规模特征,那么,投资者对规模特征的极端风格组合之间的差异会比其他特征的风格组合之间的差异更加敏感。

理论前沿动态

18. 经济增长与企业规模动态变化研究新进展

肖欢 庄子银(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

传统的内生增长理论通常假定代表性企业,而实际上企业是异质性的,它们的规模分布极不均衡,即大量小规模企业与少量大规模企业并存,企业的进入退出也非常频繁。近年来,学者们构建了一系列满足企业规模动态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型,结果表明单个企业创新、知识外溢和异质性企业之间的资源再配置共同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传统内生增长理论则忽略了异

质企业之间资源再配置的作用。这些理论还可以解释企业的规模为什么呈现出我们所观察到的分布特征。我们根据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将这些文献分为三类并简评。

一类文献认为外生冲击和外生企业技术进步会影响企业规模，引发企业进入和退出，其主要想法是：企业在付出一个固定进入成本后，获得一个初始的生产率水平，这个生产率水平服从一个已知分布。经济中的企业会遭受一些特定的冲击，历经有利冲击后企业规模逐渐增大，而遭受不利冲击的企业规模收缩，当它们的生产率水平所带来的收益低于生产的固定成本时，就会选择退出。这使得在异质性企业条件下，企业规模分布符合事实，且存在一条均衡的增长路径。

另一类文献认为企业规模的变化依赖于外生的技术冲击，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率也外生。这类文献中一部分学者认为产品种类扩张引起企业规模变化，加总经济的增长依赖于产品质量的提高，一种产品创新的成功意味着某个企业的规模扩张，另一家企业的该种产品被淘汰，对应该企业的规模缩小。所有企业的产品种类之和固定，但每个企业的产品种类数不同。创新企业遵循着一个随机的生命周期，产业均衡时仍有企业进入和退出，且存在一个稳定、不平衡的企业规模分布，但他们并未指出是何种形式的分布。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单一产品的需求数量决定企业规模。企业的规模扩张依赖于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数量，中间产品数量的需求又依赖于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在位企业采取增量 R&D 投入提高中间产品质量，进而提升生产率水平和利润；同时，潜在的进入者采取激进 R&D 创新获得一个更好的中间投入品取代在位企业。当模仿抑制任何一个部门的生产率不会过于偏离平均生产率时，稳定的企业规模分布是尾部指数接近于 1 的 Pareto 分布。还有学者认为产品种类数和进入的部门数共同决定企业规模，他们认为跨部门的知识联系会影响企业的 R&D 决策和部门进入退出决策。每个企业在不同部门创新的固定成本不同，其创新结果也受外界冲击的扰动，负的冲击引起企业退出，正的冲击让企业规模扩大，这些独立同分布的冲击内生地决定了在每一个部门中企业规模服从 Pareto 分布。

除了上文的外生和内生企业技术创新模型，另外一些学者分别结合人力资本、信息不对称及组织资本，也从宏观角度对增长和企业规模做出了很好的解释。整体来看，这些研究视角比较特别，为后续研究者考虑企业规模分布、创新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相比，这些结合企业规模动态变化的经济增长模型与现实经济情况更为贴近，企业对外界冲击的反应、R&D 投入决策以及企业 R&D 类型不断细化，结合企业规模分布状况，使企业创新的微观基础更为现实，从微观企业增长到宏观经济增长的联系更清晰。同时，目前的研究也有一些不足值得改进，可考虑将几类模型思路结合起来研究，优势互补。另外，目前关于企业动态演化的模型主要以发达国家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发展中国家这种转型经济条件下，企业规模动态演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非常值得研究。

这些理论强调企业的异质性、企业的进入退出对增长的影响，发展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注意降低一些部门的进入退出壁垒，进而促进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合理配置，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制定不同的政策，防止资源配置扭曲。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自1980年创刊以来，本刊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本刊设有中国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经济理论探索、理论前沿动态、新书评介等栏目，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CSSCI来源期刊。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和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态势，《经济评论》适时调整和更新研究主题，强调现代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大力扶持青年才俊；另一方面，全面落实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进一

步加大了与国际学术刊物规范接轨的力度,不断提升《经济评论》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 27 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 28 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全国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排名第 4;根据最新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在全国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期刊的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位居第 5。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 (<http://jer.whu.edu.cn>) 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主管: 教育部

简报责任编辑: 杨丽艳

主办: 武汉大学

联系电话: 027-68754563

编辑出版: 《经济评论》编辑部

E-mail: whujer@163.com
